陷，在于资料不足。叙例也附和说，这是由于“一切档案皆不全”的缘故。

清史资料对于清史研究及编写清史的重要意义，当然不容否认。不过台编《清史》的主持者将全书的质量不高仅仅归咎于资料不足，不仅是史料即史学这种观点的流露，更重要的在于不肯承认这是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的必然结果。

影响《清史》质量的又一重要原因，在于五十年代后期，清史研究的成果，除去个别方面外，还相当薄弱，有分量的各种专题研究很少，专史更是罕见，因而不可能对《清史稿》进行全面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订正，而只能纠正其某些史实和文字错误。《清史》第八册的五种本纪、载记和列传，所以体现一定水平，则是由于南明、郑成功及太平天国史是台湾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资料积累及研究成果较多的缘故。

一部研究雍正及其《朱批谕旨》的新著

赵 云 田

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出版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是目前国内外研究雍正及其《朱批谕旨》的一部新著。作者杨启樵，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毕业，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员，撰有明清史研究及日本汉字评论等中日文著作多种，现执教于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

早在一九四九年由宫崎市定发起，日本京都大学就组织了《雍正朱批谕旨》研读会，每周一次，冬夏无休，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举行，会员以京大师国为骨干，也有关西一带的学者。研究成果刊载在《东洋史研究》学报上。杨启樵一九六六年参加了这个研读会，并由此放弃明史转治雍正史。一九六九年春，杨启樵专程赴台，历时四月，翻阅了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仓库中的康、雍两朝两万多件朱批奏折，摘要抄录了一部分，后便以此为基础，又利用国内及朝鲜一些史料，断断续续以十年时间，始写成《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

《研究》一书由京都大学《雍正朱批谕旨》研读会主持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伯富作序。序言着重指出了《朱批奏折》的史料价值：“乃当时有关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问题之基本史料”，“此中有关地方衙门之史料甚伙，多不见于《实录》、《起居注》等官书”，“籍此可获悉地方政治之实态”。佐伯富认为：“研究《雍正朱批谕旨》，于当时社会之断面，即政治、经济及社会等真相，皆可深入了解。”

在该书《引言》中，作者回顾了雍正史研究概况，指出《研究》一书的宗旨是：“主要在讨论雍正其人：他的登位，他的暴死，以及他独创一格的《朱批谕旨》；或者通过《朱批谕旨》来看他的为人”。作者强调：“本书不是雍正帝大传或年谱，无意细大不遗地罗列出所有事迹。本书也不是雍正断代史，只是抉三五问题，略作论说而已”。

《研究》一书共分十二章。每章标题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清初族权与皇权的消长。作者叙述了自清初迄雍正君主政体的一段曲折迂回路程，认为：努尔哈赤时期因宗室地位特高，影响人君专制；太宗、世祖时则是满洲“族国合

一”政体演变到君主极权政体的过程，这是太宗不断努力压抑宗室的结果；康熙除鳌拜之后逐渐走上独裁政治之路，及至雍正，把独裁专制政体，推到有世以来的最高峰。

第二章清世宗其人其事。作者从禀性才能、喜怒哀乐、关怀臣工、勤于庶政、贱民脱籍、佛学造诣、天人感应等方面，对雍正帝做了较全面的描述。

第三章清世宗篡位说平议。作者指出，康熙晚年发生建储纠纷，太子旋废旋立，既立复废，使诸子争立的局面更加严重。太子废立之中，燃起诸皇子觊觎储位的火把，各树朋党，互相倾轧。世宗绍统后，允禩、允禵等悻悻不平，雍正为安枕高卧，遂施其笼络分化之术，各个击破，一扫而尽。清皇室骨肉相残出于争权夺势，满清以族起家，宗室具有相当势力，宗室的跋扈，使君权受到节制，为独裁君主所不容，世宗杀戮诸弟，亦如是观。世宗继序不正，乃矫诏篡立，此说不但见于野史，也出现于官书《大义觉迷录》；此外，朝鲜史料中亦屡有提及。但是，对篡立之说亦可辩驳：《大义觉迷录》所载上谕，乃世宗自辩，正因本人清白无辜，才毫无忌惮公诸于世；朝鲜史料多来源于朝鲜使者和中国官员的交谈，有其局限性，朝鲜人又往往获得假情报，故朝鲜史料常前后矛盾。孟森先生以为世宗继统不正，主要理由是：一、授受之际不明；二、《大义觉迷录》有谋父记载；三、年、隆为夺嫡帮凶；四、圣祖早属意允禵；五、高宗怪金铁多事。然孟先生上述诸点，多可讨论。王钟翰先生《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祯西征纪实》以丰富史料作后注，文章精简可读。但就奏折、大义觉迷录、实录删修问题，亦颇有武断、曲解、穿凿、附会之处。允禵原名胤祯，初见于《皇清通志纲要》及《元功臣名录》。改“胤祯”“为胤禛”，比改“传位十四皇子”为“于四皇子”的说服力强，这是王文的最大贡献，但仍缺乏与篡立的直接关系。金承艺两篇文章《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认为胤禛是世宗因利就便，在篡夺大统时假造出来的，还认为王掞等心目中的储贰是允禵。实际上这些说法都不确切。另外，金承艺《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一文，认为雍正之世，世宗曾强行占用乃弟胤祯之名，至乾隆时始为高宗窜改成胤禛，此论更为离奇，也难令人心折。

第四章清世宗与年羹尧的恩怨轇轕。作者从七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羹尧不当年长于世宗。据朝鲜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世宗长羹尧一岁。世宗与羹尧是郎舅关系，但彼此并不融洽。世宗继位，年羹尧并未做什么贡献。世宗断非杀羹尧灭口。雍正初羹尧受到宠信优渥，不纯粹是笼络，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要不是羹尧锋芒毕露、作孽多端，不特能保全性命，而且恩遇和结局当不下于鄂尔泰、李卫诸人。世宗通过臣下密折，得知年羹尧劣迹，而且多得出乎意外，且无悔艾之念，才决心将其处死。羹尧罹罪反映了世宗赏罚分明的个性，宠之深而责之切的心情。总之，允禵虽不满世宗继位，却无兵变意图，自毋庸羹尧钳制。陈捷先《雍正初年清世宗与羹尧之君臣关系》一文，所引《永宪录》材料，将雍正三年五月间事，误认为二年间事，故其结论亦不正确。

第五章清世宗的心膂股肱（上）——田文镜的例子。作者从发迹缘起、罢考事件、对抗科甲、科甲党援平议、得宠缘由、为政苛严说质疑、藩邸旧属说质疑、夤缘怡亲王说质疑、先疑而后信、健康状况、逸事数则等方面，对田文镜及其和清世宗的关系做了全面的叙述。

第六章清世宗的心膂股肱（下）——李卫的例子。作者从发迹缘起、为政手腕、生性骄纵、李卫与田文镜、逸事数则、讲究武艺、健康状况等七方面论述了李卫及他和清世宗的关系。

第七章雍正初年的政局。作者论述了雍正初年贪风横行、朋比党援、言官溺职的政治局

面，以及世宗的整饬振刷，指出：世宗粉碎朋党、整顿吏治的措施主要是，弱化宗室八旗势力，以巩固君主独裁权；利用朱批密折搜集情报，使全国官民尽在掌握之中。

第八章密折政治缘起及内涵。作者追述了清初奏折政治的缘起，讨论了题、奏本章的缺点，指出："清代密折可能肇端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至雍正而大盛"。作者从交批规定。推广密奏、密折限度、保密义务、密折内容、面训传谕、密查官箴、相互监视、密折规章、密折作用、题奏之分等方面，对雍正时期的朱批密折做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密折早起于清初，但称得上制度，当始于雍正朝。"奏折作用归纳起来有十点：一、官员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二、督抚等大员不能擅权；三、人人存戒心，不敢妄为，恐暗中被检举；四、露章有所瞻顾，不敢直言，密折无此顾虑；五、有所兴革，君臣间予先私下协议，不率尔具题，有缓冲余地；六、以朱批为教育工具，借此训诲开导臣工；七、臣工得朱批之鼓励，益自激励上进；八、人才之登进、陟黜，借密折予作安排；九、自奏折中见臣工之居心制作；十、广耳目，周见闻，洞悉庶务。

第九章朱批谕旨析疑。作者认为雍正十年《朱批谕旨》的编纂出版，目的在于继承清初诸帝好发议论的传统，确立身后的评价，当然，与曾静事件激发也有关系。作者指出，朱批奏折原件与刊本颇有出入。存在北京的是《雍正朱批谕旨》原件，台北的乃是润饰后的修订稿。《雍正朱批谕旨》的编纂，在高宗继位后，或有一段时间停顿，否则无须延至乾隆三年始成书。世宗驾崩前，《朱批谕旨》已印行相当数量，其后高宗又略添雍正末年检定者付印，就成目前刊本模样。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约二万二千余件，但这也并非雍正朝奏折的全部。雍正朝朱批奏折原件，有已录、不录和未录之分。现存二万多件雍正朝朱批奏折，其中三分之二属不录，多为交批、谢恩、请安、私事等秘密性较少的奏折。作者在本章后面"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朱批奏折提奏人一览表"附件中，粗疏统计，提奏人是1113名，奏折为22672件。

第十章朱批谕旨缘何窜改。作者指出，《雍正朱批谕旨》付梓前曾作窜改，究其原因，一方面为了纠正错误，整齐样式，润饰文字；另一方面也有因忌讳而删改的。

第十一章朱批谕旨如何窜改。作者指出，雍正十年(1732年)《朱批谕旨》开始编纂，主编鄂尔泰、张廷玉，参与其事者尚有刑部左侍郎刘统勋及词臣近二十名。此书经过绵密审定而成稿，几乎每件奏折都须审核和修改。鄂、张只是挂名，实际上多由世宗亲自决断。作者就鄂尔泰、田文镜奏折实例，探讨了《朱批谕旨》窜改时采取的于原折上直接添削、另纸誊写后删修等几种方式。

第十二章清世宗暴死之谜。作者指出，一些稗官野史说世宗遇刺毙命，穷其原因，大致是：宫闱生活讳莫如深，充满神密色彩，民间对此抱有无限好奇心，以致以讹传讹，远离真相；满人入关后，反清复明运动仍很激烈，从兴义师到秘密结社，用各种方式打击清王朝，说世宗遇刺毙命也属于打击的一种形式；圆明园遇刺客之说确有其事，但那是在嘉庆八年。有人把嘉庆当雍正，搞混了；官书上有关世宗之死记载甚简，又没说病情，因而易引起人们猜测。作者认为，世宗之死，可能服饵丹药中毒而致。这从世宗死后只隔一天，炼丹道士就被驱逐出宫；世宗生前对道士和炼丹术非常热心，可看出一些端睨。另外，一些原来密藏在宫禁内从不公诸人世的档案，也在这方面给了人们某些启示。

总之，《研究》一书，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未公布的档案原件，广泛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叙事谨严，议论得当，书中附有必要的插图和表格，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专著。但是，

正如作者所承认的：由于“有些重要课题，如军机处，耗羡归公，社会动态，地方乡绅等都付之阙如”，所以，利用《朱批谕旨》研究雍正朝清代社会这一任务，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也正因为此，本书使人感到不够深入，这无疑是一个缺憾。

B·C·米亚斯尼科夫著《十七世纪的清帝国与俄国》

(日)吉田金一著　冯佐哲译

该书作者是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中俄关系史专家，现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他曾经参加过《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的俄中关系》(莫斯科，一九五八年)、《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第二卷以及《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的编辑工作。并且还发表过《第一批使华的俄国外交官》（与人合作，莫斯科，一九六六年）（一）及其他多篇论著。此外，他还整理出版了斯卡契科夫的遗著《俄国汉学史的概论》（莫斯科，一九七七年）等书。因此可以说他是目前苏联有关这方面研究最为活跃的一个人。正如作者所说，若了解俄中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十七世纪后半期的俄中外交史。过去以此为主题的著作虽然发表了不少，但还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出版了如《徐日升日记》与《戈洛文出使报告》等重要资料，并且在南朝鲜和台湾等地也发现了有关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作者要发表在此介绍的这部著作，作为一个同行，我一直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同时也在想，这部书问世后，恐怕就不会有我们研究的余地了吧！然而，当我读过承蒙作者赠给我的这部著作后，第一个感想就是我还有研究的余地，这是因为这部著作虽然给我们启示的地方很多，但也还存在多处漏洞与讹误，并且就该书来说在不少问题上，我还与著者有不同的看法。

我在此拟想一面概述这部著作，一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首先指出清朝对俄国的外交基础是把中国自古以来的外交理论作为理论，接着他认为十七、十八世纪远东最强大的国家——清朝的外交，恰如名为《平定××方略》的一系列书籍所表明的，是以准备推行和完成扩张领土的战争为主要机能的。他还认为“方略”一词就是意味着长期外交战略，而保证这个战略实现的就是诡计与阴谋等手段。并且在这方面的目的是把手段合法化的理论优先于国际上的规范，他把这个叫做 Стратагем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я（是否应译成策略外交？）。他认为这样的清朝的外交技术之所以在清朝形成，是它与对明朝、朝鲜以及蒙古的交涉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关于缔结条约是它学习了中国古代和通过在台湾问题上与荷兰缔结条约以及它与俄国缔结条约的经验，在十七世纪已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接着便谈到了本书的正题。

首先，作为清俄外交的序幕应提到一六一八年H·彼特林的出使北京。这虽然是以侦探为目的而被派遣来华的，连敕书都没带来的低级使团，但得到了明朝的大吏的接待并承受了万历皇帝的敕书，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明朝北部地区局势不稳所导致的。但是因为没有派遣后续使节，故没能成为中俄建交的契机。

中俄建交的条件是在一六四四年清朝入关前后才成熟的。著者认为条件之一，就是一六四九至一六五二年E·П·哈巴罗夫的部队最终将黑龙江流域吞并为俄国领土（重点号为本